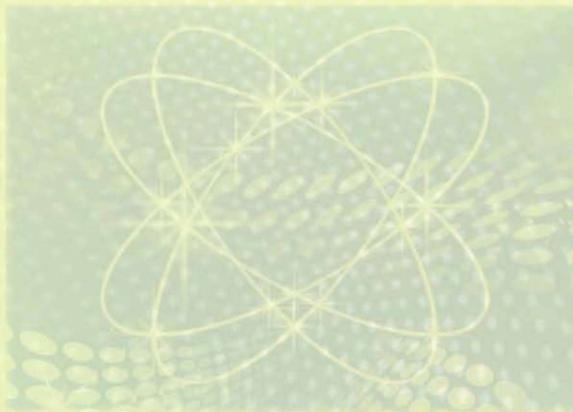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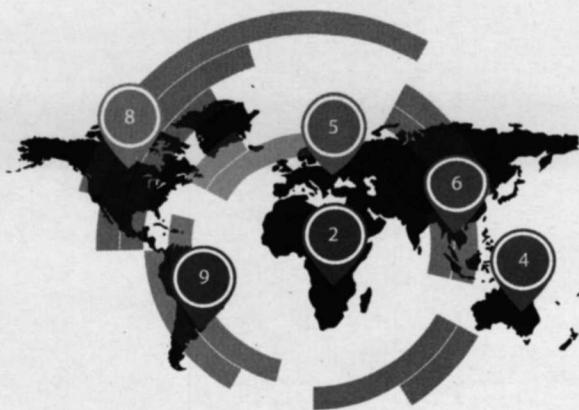
社会资本 与区域经济发展

吴光芸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资本 与区域经济发展



吴光芸◎著

Social Capit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 吴光芸著.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01-07529-7

I. ①社… II. ①吴… III. ①社会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96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开本 15.5 印张 1 插页

字数: 240 千字

定价: 42.00 元

本书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09YJC810021)资助

本书获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资助

总序

杨 龙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趋势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的，随着中国的经济继续向中等发达阶段进展，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提出越来越多的跨行政区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新世纪的发展目标下，区域合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区域合作的基本动力来自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形成等都是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与此同时，政府在区域合作中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点，在区域合作方面，不仅中央政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也有强烈的合作动机。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促进下，中国的区域化进展得以加快。如今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出现多样化的特征，沿海和内陆、东中西三大地带等传统的区域概念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区域发展现状，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区域色彩鲜明的区域概念。截至目前，仅国家级改革试验区就达到 10 个，而且各不相同；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远远超过 10 个。这些区域有的是跨省的，有的是省内的；有的在沿海地区，有的在西部内陆；沿海、沿江、沿湖、沿边境等合作区域纷纷出现。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区域合作大体上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目前国内区域合作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恰恰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最快的两个区域。其他各种跨行政区的合作区也都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区域可以提高地方的竞争力，同时也要求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区域合作的一个动力是地方之间的竞争，形成区域成为提高竞争力的一种手段。与原来的地方竞争不同的是，经济区域化背景下的地方竞争是在地方合作的基础上的区域竞争。经济区域化的一个后果是给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少的行为，而对地方政府间的合作目前还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

2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的一个结果是没有对地方合作的明确限制，这反而促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多样化发展。据估计，目前国内各类区域合作组织已经超过200个。各地从自己的发展需要出发，与相邻地方合作，合作的方式和深度根据各参与方的意愿商议进行。在某些地方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中央安排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对口支援，在数量和形式上呈现增加的趋势。

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另一个特征是国内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激烈，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目前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区域内地方政府通过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以提升地方发展的竞争力。地方政府合作提高区域竞争力，成为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一种新的手段。

国内经济区域化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同步发展是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拓展了政府与市场互动的一个新领域。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中国政治体制选择和行政区划制定，中国政治上集权的体制有利于克服来自地理地形的地方阻隔，而地理地貌以及附带的地域文化也成为了行政区划划分的标准。当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特征的时候，跨越行政区的经济联系增强，越界行为越来越多，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张力随之明显起来。为了消解经济区域化与行政区划之间的张力，借助区域的整体力量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间合作就成为地方政府一种合理的发展策略。在此发展阶段，面对地方发展的新趋势，中央政府对地方之间通过合作而发展持乐得其成的态度，没有限制地方合作；地方政府则以区域合作作为一个重要的创新机会，就此展开地方之间的竞争。国内的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均得以丰富。

根据以上分析，“区域治理与政府间关系”丛书拟体现以下研究的成果。在单一制政体下，中央政府的职能设计、中央对地方的授权、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划分等体制因素，决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这些制度因素制约着经济区域化的发展，因此适应经济区域化发展的要求，政府职能和政府间关系需要调整。政府职能的调整不仅要考虑经济区域化的需求，也要从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出发，把城乡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培育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等考虑进去。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以后，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参与地方事务的治理模式形成，在政府之外，企业和社会组织均加入区域治理。在中国经济开放、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由于本身的跨国家和跨行政区运营的特点，成为中国国内经济区域化发展和政府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鉴于国内区域合作在近年来的多样化发展，

总 序 3

在目前国内关于区域合作的案例研究较为丰富的基础上，一方面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区域合作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总结和分析地方政府合作的一般特点的时机也已经成熟。目前国内对于在特定行业和领域区域合作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需要在经济区域化的背景下，分行业或领域研究地方政府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在区域治理和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方向下，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有其他成果加入本丛书。

2011 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7)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辨析及界定.....	(17)
第四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内容安排.....	(22)
第一章 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	(29)
第一节 社会资本解析.....	(29)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式与研究领域.....	(55)
第三节 社会资本的运行机制.....	(62)
第二章 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发展	(74)
第一节 产业集群的社会资本分析.....	(75)
第二节 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的作用.....	(80)
第三节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产业集群发展路径探讨.....	(101)
第三章 社会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	(107)
第一节 区域技术创新及其社会资本因素.....	(107)
第二节 社会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的作用.....	(112)
第三节 基于社会资本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	(118)
第四章 社会资本与区域合作	(138)
第一节 我国区域合作的现状、困境及其社会资本因素.....	(138)
第二节 区域合作：将社会资本纳入分析视角.....	(145)
第三节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区域合作的路径探讨.....	(161)
第五章 社会资本与区域治理	(172)
第一节 区域公共问题的兴起与区域治理.....	(172)
第二节 区域治理的基础：社会资本与多中心治理.....	(178)
第三节 社会资本在区域公共事务多中心治理中的作用.....	(192)

2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第四节 基于社会资本的区域治理启示：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商与合作	(209)
结语	(215)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215)
第二节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17)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40)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假说：一是自然条件说，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发展得更好；二是比较优势说，认为每个区域都有一些相对优势，如劳动力便宜或资本报酬率高，每个区域依此发展就形成了区域间的差距；三是政府投资说，政府的介入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四是制度、组织说，认为经济行为是附着在社会关系上的，一个区域发展成功与否，不在于有多少资源或政府投资，而在于相配合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等因素，特别是习俗与制度性力量的整合。在第四种假说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利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阐述文化、制度与风俗习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有社会组织、社会传统、社会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等各种文化因素。文化（包括信任、规范、制度、传统、网络、形象等）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所谓的“文化力”、“人文经济”。

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文献中，我国学者似乎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对于“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以规范、信任和网络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资本”。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国家或地区，虽然客观上拥有相同的物质资本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相关的国家资源，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竞争力的形成上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水平和绩效。

2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它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不同。^①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不是一个地区天然拥有的，而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生成的。社会资本形成之后，便成为影响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也是这一地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讲，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以规范、信任、网络、文化认同为核心，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是社会机构、社会成员具有互动作用的生产性社会网络。即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或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在区域内，社会资本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的交流与沟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直接存在于区域的企业、产业集群等组织和群体之中，成为企业、集群乃至整个区域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追求。

世界银行近几年也对社会资本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另一个能够对高质量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的力量来自于一个国家的非正式制度的强化，即所谓的‘社会资本’。”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又把“社会资本”看做是增长的源泉之一。^②有数据表明，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资源中，以网络、关系、参与和信任为测度标准的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超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③

目前我国有三大区域经济领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与该区域内丰富的社会资本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学者在分析浙江温州和福建晋江等地的产业集群时，认为其成功的条件之一是良好的社会资本，它可以促进企业之间的信任，增强企业合作的意愿，减少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加快集群内知识的扩散和应用。如温州人特有的文化所形成的大营销网络为当地的产业集群走向市场作出了重要贡献。福建晋江开放、趋利的经商传统，冒险、进取的拼搏精神，内聚、强力的家族主义，重利、轻迁的习俗，为晋江鞋业集群的萌芽发展以及集群内部关系的协

① 弗朗西斯·福山，彭志华译：《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② G. M Meier, J.E Stiglitz, (ed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Bank, 2001.

③ Landry, Amara and Lamari, "Does Social Capital Determine Innovation? To What Extent?" *Technological and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Policy and Innovation, Curitiba, Brazil, 2000.

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资本环境。^①这些成功经验表明，区域经济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区域内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信任、合作、规范、网络、文化认同等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作用，但仅仅依靠社会资本并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单独的一种社会资本是不够的。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并和它们一起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是受多个因素共同影响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主要影响因素不同。这些因素往往交织、融合在一起，发挥类似于合力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只能在比较全面地考虑各个因素的基础上单独分析某一因素的作用大小及作用机理。本书就是遵循这一思路，在考虑文化、信任、规范和制度等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基础上，分析非正式制度、地缘文化与价值观、区域历史资源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社会资本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并对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初步的探讨。

二、研究的意义

(一) 理论意义

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索，一直是经济学家不懈的追求。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理论，提出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从而奠定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又称新古典增长理论，弥补了资本积累理论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率决定的缺陷，提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认为增长率不是取决于投资，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罗默（Romer,美国）、卢卡斯（Lucas,美国）、巴罗（Barro,美国）、贝克尔（Becker,美国）等人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系统内生因素所决定的，并分别从人力资本的演进（阿罗，1961年）、人力资本的积累（卢卡斯，1988年）、局部性学习（斯蒂格利茨，1986年）等方面说明技术进步的内生性。罗默强调知识积累率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是决定增长率的关键因素，卢卡斯则强调表现为技术进步的人力资本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源泉有不同的理解，但都充分肯定了人力资本在这个过程

^① 林竞君：《网络、社会资本与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个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中的重要性。

以道格拉斯·诺思 (Douglass C.North, 美国) 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突破了古典经济理论“制度既定”的传统假设，强调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物质资本的投入、资本积累、技术创新本身就是增长，是对制度效率的印证，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框架。这种博弈规则分为两大类——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其中正式规则包括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等，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①这些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所谓的“文化力”、“人文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阐述文化、制度与风俗习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为解释非经济因素对国家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解释范式，也进一步扩展了资本的定义。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1999年世界银行组织的一个小组，其成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美国)，调查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状况。这一调查的基本结论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自身社会资本的缺乏是导致这些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而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群体、地区经济发展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作用。

本书将社会资本看做继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后的另一种资本范畴，解释区域文化、社会规范、社会网络、规则和信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使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跳出传统的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的框框，开始关注一个地区的文化、规范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

(1)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学者们为了自己的研究需要，纷纷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要素加以界定，导致社会资本概念的泛化，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给社会资本研究造成了很大障碍。在本书中，笔者将融合社会资本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相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

^①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7页。

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运行机制进行研究。同时将制度经济学所探讨的非正式制度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来更好地解释区域文化、规范、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2)有关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书将在关注社会资本理论和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热点的基础上，通过产业集群、区域技术创新、区域合作、区域治理四个方面来阐述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目的是让我们的学术界在注重有形资本研究的同时也注重无形资本，充分意识到社会资本已成为产业集群、区域技术创新、区域合作及区域治理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致力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设，寻找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投资^①社会资本。

(3)凸显社会资本的政治学意义，发掘社会资本的政治学价值。公民参与、非政府组织、社会规范以及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等，都是当前摆在政治学面前的重大研究课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对于如何通过自发性社群组织的黏合作用以重振公民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为探讨区域地方治理并进而扩展到我国公共治理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

(二)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总的来说，东南沿海地区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等地区是最发达的地区，区域竞争力很强；而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中国经济起支撑作用的中部地区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实力日渐衰弱，区域竞争力也大不如东南沿海地区；广大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速度慢，区域竞争力既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也不如中部地区。资金、技术资源、投资等固然是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但社会资本其实也是造成这些差距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地域广大，东西南北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思维理念，其直接影响着该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面貌等，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或制约作用。西部地区由于受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耕文化的影响，区域内各类经济主体保守意识浓厚，竞争与协作精神、创新与风险意识、市场与经营观念缺乏，不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思想动力。而东部地区，

^① “投资”这一提法受燕继荣老师的启示。他提出“投资社会资本”的概念，并不是要说明怎么投资社会资本，而是要说明为了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进行怎样的投资。也就是说，“投资社会资本”所讨论的并不是把社会资本投向哪里，如何投资才能收益的问题，而是怎么向社会资本投资，即通过怎样的方式和途径增加社会资本储存量的问题。具体参见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一种政治发展的新纬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6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如长三角地区拥有开放、实用的吴越文化，有大量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商业，文化与经济互动良好；珠三角地区拥有强烈的开放性、冒险的进取心，崇尚商贸、农商并重等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很好的社会资本氛围。总体而言，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区域与中西部广大欠发达区域相比，在市场传统、竞争意识、规则观念、法治精神、参政水平、区域形象、信任水平（包括政府信用、社会信用、企业信用、行会信用和个人信用）等方面，前者要远远高于和好于后者^①，因而它们各自的社会资本的内容和实质也是不同的，这又导致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亲缘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已成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形式。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会积极利用血缘、亲缘这样的社会资本来增加预期效用。一些地区就善于利用这些社会关系来发展经济，并且成效显著。福建、广东等地广泛吸引和鼓励海外亲属、朋友等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回到家乡投资办厂，繁荣了当地经济。浙江产业群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成千上万的家庭工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在浙江同类产业的地域聚集过程中，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文化和关系网络，无疑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温州家庭工场依靠家族、邻里、朋友等多种社会关系联结成一个个企业网络，网络内部存在着密切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同的企业网络之间又存在着众多或强或弱的联系，使产业群成为一个无形的大工厂^②，行业协会和商会将集群企业聚在一起，交流经商的信息、经验、教训、体会，彼此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从政府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政府大多比较开明，具有主动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意识，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挖掘、培养、运用社会资本以发展当地经济，如创造适宜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制定一些发展经济的地方性规章、尊重个体的创业精神并合理引导等。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做得还不够完善。西部地区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物质方面，而在于社会经济体制、组织制度、思想观念、传统习惯，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资本方面的欠缺。社会资本的欠缺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滞后、制度创新乏力、政府效率低下、公民缺乏信任感等。所有这一切，都是造成一个地区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③政府在投入人力资本、物力资本的同时，更应该为其创造更好的社会资本环境。也就是说，

① 陈瑞莲：《区域公共管理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

② 朱华晟：《浙江产业群——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③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时，除了要重视有形资本的开发外，必须同时重视无形资本的开发。因此，探讨社会资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一)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社会资本是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社会发展的新范式，甚至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关于社会资本的零散论述见于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家的一些研究与著述中。1980 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 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从社会网络的角度正式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并就它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但由于他是用法文发表的，在英语社会科学界并没有引起重视。1988 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中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化。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D.Putnam) 发表了《使民主运转起来》，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几年，他又连续发表了《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公民美国的奇怪消亡》、《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这些文章引发了关于社会资本的大讨论，成为 20 世纪末期西方学术界一道风景线。从此，西方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据统计，在 1990 年之前，在科学索引网 (the Web of Science Index) 上只有 2 个关于社会资本的引文，而到 2007 年，这个数目却增长到 2594 个。根据对北京图书馆的检索，国外十多年来标题或关键词中含有“社会资本”字样的专著有 141 本。国内翻译的专著有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科尔曼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林南 (Nan Lin, 美国) 的《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格鲁特尔特 (Grootaert, 美国) 和贝斯特纳尔 (Bastelaer, 美国) 编的《社会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帕萨·达斯古普特 (Partha Dasgupta, 美国) 和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 (Ismail Serageldin) 编的《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日裔美籍社会学家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信

8 社会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

任)和《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一些国外学者的论文集《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李惠斌、杨雪冬)、《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曹荣湘)，这些专著奠定了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与研究基础。

(二) 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研究

有关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巴罗(1997年)、阿莱斯纳和罗德里克(Alesina and Rodrik, 1994年)、萨克斯和沃纳(Sachs and Warner, 1995年)、科里尔和昆宁(Collier and Gunning, 1999年)、奈克和凯夫(Knack and Keefe, 1995年)、马罗(Mauro, 1995年)、特姆普和约翰逊(Temple and Johnson, 1998年)以及费德克(Fedderke, 1999年)等人，他们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制度、社会互动和稳定的关系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很重要。比如，杰普(Hjerppe, 1998年)在控制了物质资本、贸易开放度和教育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①的数据来源，发现在27个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抽样样本中，信任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显著关系。奈克和凯夫(1997年)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从宏观层面实证考察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考察的指标是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他们运用29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从中得出了三个重要结论：第一，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第二，与帕特南研究意大利地区经济差异得到的结果相反，协会活动与经济绩效没有太多联系；第三，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利，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当然，建立正规的法制和信贷机构在那些低信任度的国家是特别重要的。^②查克(Zak)和奈克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所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低的信任环境会减少投资率和增长，而高信任环境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他们通过控制了产权等变量进行跨国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该模型的结论。^③

其他研究者还认为信任可以刺激储蓄、投资和风险行为，桂塞等人(Guiso,

① 世界价值调查是由罗纳德·英格勒哈特和全世界其他合作者组织发起的，是一种包括200个问卷项目的调查，这些项目涵盖政治、社会及道德方面的价值观，还有个人偏好、工作伦理、宗教信仰，以及人们世界观的许多其他方面。这种问卷调查于1995、1996年全球调查盛行时在68个国家执行过，只有非洲和中东一些欠发达国家至今从未进行过此种调查。近年来，人们使用该调查中的很多数据来进行各国社会资本的研究工作。该调查询问了被调查者在不同集团的成员身份、对社会合作行为的态度、对他人的信任程度以及对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宽容度。

② Knack S and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 (4), pp.1251-1288.

③ Zak P. and Knack S, "Trust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2001, 111, pp.295-321.